

像硬米粒儿一样的傅雷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张焱

杨绛的记忆

杨绛与傅雷相识在抗战胜利前夕,当时两家都住在上海,相距不远,晚饭后钱钟书和杨绛常去傅家夜谈。那时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,空气压抑、窒息,杨绛晚年回忆说,只有到了傅家朴素幽雅的客厅,见到傅雷夫妇和朋友们,才一扫日常生活的沉闷与苦恼,呼吸到新鲜的空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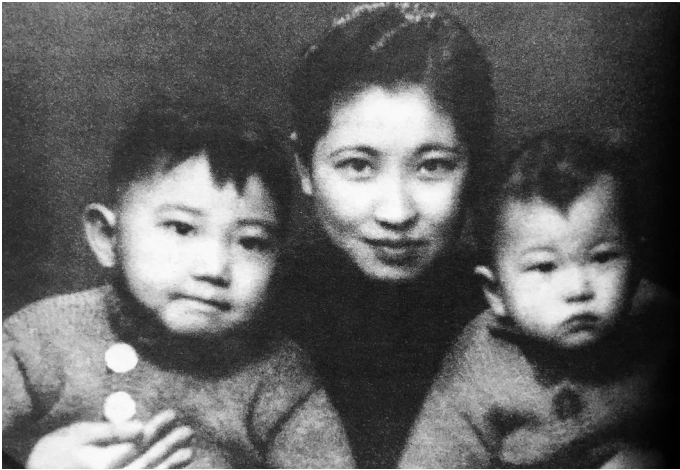
傅雷早年丧父,母亲对其管教甚严,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,性格难免有些偏执、孤拗,所以傅雷在人们印象中是个严肃的人。但杨绛眼里的傅雷却是个含笑的兄长,总是捧着个烟斗,待要放到嘴里抽,又拿出来,“眼里是笑,嘴边是笑,满脸是笑”,这个笑眯眯的傅雷与众人眼里严肃的傅雷是不是有些大相径庭?

但傅雷的笑脸只是朋友的,在孩子面前,他又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严父。傅雷有两个儿子傅聪和傅敏,那个时候还是调皮的小顽童,最爱听“钱伯伯说话”,每当钱钟书和杨绛去傅家聊天时,总爱躲在客厅外偷听,而这又恰恰是傅雷绝对不允许的。杨绛曾在文章里这样写道:“有一次,客厅里谈得热闹,阵阵笑声,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。忽然他灵机一动,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,把门一开,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,正缩着脖子笑呢。”

傅雷一声呵斥,两个孩子马上逃跑,但过一会儿傅雷又突然开门,孩子依然坐在原处偷听。傅雷关上客厅门出去,杨绛他们听到傅雷的斥责声,妻子朱梅馥的责怪和调解,还有孩子的哭声和辩白。因为熟悉傅雷的脾气,客人们也不敢劝解,还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,不一会傅雷回屋,脸色气得铁青,朱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,朋友们告辞后不免议论:“傅雷对孩子就是这样!”

多年以后,傅聪回国去钱家拜访,毫无顾忌地听“钱伯伯说话”,高兴得哈哈大笑。忆及童年旧事,傅聪告诉杨绛:“爸爸打得我真痛啊!”但他也知道,爸爸打他是對他严格,正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。朱梅馥也曾对杨绛说过,傅雷情绪激动时对孩子这样严厉,但沉静下来会责怪自己,又会增添新的苦痛——杨绛笔下这个严厉得不近人情的傅雷,与《傅雷家书》中那个温情脉脉的父亲,其实都是真实的傅雷,同一个傅雷,只不过是他的两个侧面而已。

杨绛眼里的傅雷是直率、硬朗、执着的,“像硬米粒那样僵硬、干脆,软和儒不是他的美德。”1954年翻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傅雷没有与会,只提供



朱梅馥与儿子傅聪、傅敏。

了一份书面发言。傅雷在发言中列举了翻译中存在的许多谬误,举出了一些例子,但他忘记了这些例子都是有主人的,并且这些主人大都在现场,结果是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,有一位老翻译家甚至被气得大哭。事后钱钟书写信责备傅雷孟浪,傅雷气呼呼地与钱氏夫妇中断了联系,不过很快就恢复了通信。

后来杨绛评论此事说,翻译工作非常琐碎,难免会出错,如果傅雷先挑自己的错误做引子,或者事先和朋友们商量、沟通一下,别人也许会心悦诚服。凭心而论,杨绛的话非常正确,大部分人也都会这样考虑,但傅雷不会,如果那样就不是傅雷了。

楼适夷的不满

傅雷的老友楼适夷也与杨绛一样,对傅雷管教孩子印象特别深。《傅雷家书》出版后,楼适夷以故交的身份欣然作序,他在序言中说:“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,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。……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,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。”

朱梅馥的侄女朱佛容小时和傅聪一起进小学读书,据她回忆,没过多久傅聪就退学了,原因是傅雷对老师的教育不满,领回家里自己教去了,这与楼适夷的记忆是吻合的。

楼适夷对傅雷教育孩子的方式颇不以为然,甚至有些反感。他与傅雷来往密切,经常在傅家落脚,在他印象里,傅聪和傅敏在爸爸面前总是小心翼翼,不敢随意说笑。傅雷甚至连孩子如何说话,怎样行动,做什么,吃什么都有明确规定,并且不能有任何逾越,比如说吃饭时,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,是否发出不礼貌的咀嚼声等,朱佛容也说过在姑姑家吃饭很受拘束,因为姑父对孩子要求太严格了。

楼适夷在《傅雷家书》序言中还提及一件旧事,那时学生中流行使用自来水钢笔,但不知什么原因傅雷却不让孩子使用,只允许他们用铅笔、蘸水钢笔和毛

笔。楼适夷不知道傅雷这个家规,有一次他带傅聪去豫园玩儿,顺便给他买了一支很好的儿童金笔,结果可想而知,傅聪一回家钢笔就被没收,害得孩子大哭一场。后来楼适夷才知道这场风波,总觉得对不起傅聪,让他受了委屈,同时也对傅雷独裁的家长作风非常不满。

知子莫如父,傅雷虽然对孩子严厉,却能从一些细节发现孩子身上的潜质,他曾在文章中写道:“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,就爱听古典音乐。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,不论是声乐是器乐,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,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,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。”所以他坚持让傅聪学琴,按照父亲的吩咐,傅聪每天练琴几小时,即使弹得手指酸痛也不敢放松。有一天傅聪突然心血来潮,离开琴谱,奏出一支自己的调子来。傅雷正在书房工作,察觉到琴声有异,便出来查看,傅聪看见父亲,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。但傅雷这次没有责怪傅聪,而是让他重新弹奏那首曲子,还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,称赞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,后来还给起了一个题目,叫做《春天》。

楼适夷对此事记得清清楚楚,后来傅聪在父亲培养下果然成为著名的钢琴家,这也让楼适夷改变了对傅雷的看法:虽然教育方法不可取,但作为个例还是成功的。

宋家人的印象

1949年6月,傅雷夫妇和小儿子傅敏应好友宋淇之约去香港住了大半年时间,当时全国差不多都已解放,傅雷决定回内地。此间他在北京盘桓了一段时间,拜会了钱钟书、杨绛等一些老朋友,吴晗想请傅雷到清华大学教授法语,虽然傅雷对美丽的清华园也很留恋,但却不愿教法语,最终还是回了上海,继续他的翻译工作。

到上海后,傅雷一家住进了宋淇位于安定坊5号的房子,一

住就是十几年,直到去世。

宋淇是著名戏剧家和藏书家宋春舫之子,出身世家,家境优裕,1949年后到香港从事翻译和文化工作。宋淇与傅雷的关系很特别,既是房东与房客,又是翻译界同行,还是相知很深的好友。1950年两人分离后,通信近十年,从这些来往书信中看出,傅雷与宋淇全家都很熟悉,经常问候,两家称得上是通家之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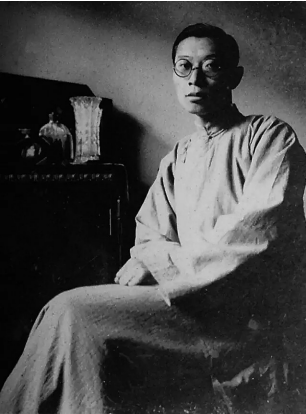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宋淇的祖父和母亲都留在上海,傅雷一家与他们住在一起。安定坊5号是一座独立的洋房,红色瓦顶,有单独使用的花园,舒适、漂亮。进门左边是一楼的房门,右边有楼梯直通二楼,傅雷夫妇住在一楼,孩子的卧室在阁楼,宋淇祖父和母亲住在二楼。

在宋家人心目中,傅雷是个做事无拖无欠的人。宋淇岳父家有一架钢琴存放在安定坊5号,傅聪正在学琴,以傅雷与宋家宛如家人的关系,他本可以随便使用这架钢琴,但傅雷却为此事专门致信宋淇:“阿聪借用邝家(宋淇岳父家)的琴,早晚必要敲得不成样子,在我们也不能交代。而他学琴已成骑虎,看来买琴一事,在所难免。你能否代问邝老太太,有意将该琴出让否?若然,我可请人估价,再函征同意。”十几天后,傅雷又写信说:“钢琴已叫两家琴行估过,一出500万,一出550万,当然以后价为标准。”

建国初期使用的还是旧币,10000元相当于后来的1元新币,也就是说,傅雷买的这架钢琴价值550元。这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,傅雷建国后并无任何公职,完全依靠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的稿费养活全家,据傅家保姆回忆,傅家除了每月55元房租和48元伙食费开支外,其他钱都用在傅聪学钢琴上了,当时的学费价格不菲。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,傅雷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,甚至还有些拮据,在这种情况下,傅雷依然坚持向远在香港的宋淇买琴,从中也可看出他的性格。

后来宋淇突然中断了与傅雷的联系,傅雷多次去信他也不复。宋淇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,因为当时国内政治气候已有些异常,宋淇担心自己的身份会连累傅雷一家,多年后他在信中向傅敏解释:“自我母亲死后,我故意不寄信给他们(指傅雷夫妇),来信也不复……其实那时我们已觉情况不妙,和他们通信可能惹上海外关系复杂的按语。”

朋友的心是相通的,最了解傅雷的还是他的朋友们,从他们眼里,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傅雷,一个鲜活的傅雷,一个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傅雷。☞



像硬米粒儿一样的傅雷。



《傅雷家书》。